

---

---

# 李建民：《民國的痛苦：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》。臺北：聯經出版，2022年，352頁。

梁右典

黃岡師範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

---

---

民國史或稱近代史領域，一般以西風東漸的文化現象最為人所知，由物質到形上、從制度到精神等，無一不是如此。光緒元年（1875），李鴻章（1823-1901）〈因臺灣事變籌畫海防折〉那句「數千年未有之變局」<sup>1</sup>更是一語道破當時氛圍所在，其實亦指出知識人感到無所適從的窘境。此一大變局之前既無史實可尋，因而感受精神世界瀰漫著迷惘之風者大有人在，應當如何解釋現存景況，又該有何種思想資源可供接引，不能不說此成為一大問題。因此，每當我們解釋此時之知識人的心理狀態，往往以「精神危機」、「文化危機」或「意義危機」加以指稱，而對於知識人的自殺解釋還有研究空間，賦予當中的意義不僅是個人的，其實也是構成群體的、文化的與一切思想的意義。本書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建民撰著，名為《民國的痛苦：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》，就是「特別關心當時學者的生活處境（life setting）」（見頁15）。換句話說：這也是一本關於「痛苦感的歷史」的書（見頁18），而且此種「痛苦」是如何形成的，又當如何消滅除去此痛苦根源，則必扣求當時史實，由此而更瞭解自己、民族與國家（見頁17）。其中，代表人物之一即是王國維（1877-1927），本書作者嘗試探討的路徑是不僅瞭解王國維的「痛苦感的歷史」，而且也能夠再探究兩個問題：

書評

---

1 李鴻章：〈因臺灣事變籌畫海防折〉，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。參見梁啟超：《李鴻章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52。

即「王國維之死，是探索他的道德懷疑主義」或是「民國時期集體的文化危機」（見頁 55）。因此，書中涉及內容以「民國的痛苦」為主題，副標則以「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」呈現。乍看之下，則是採取以小窺大的歷史論述，其實這也扣合歷史學者熟悉的歷史脈絡考察，亦即對於王國維死亡之分析，進一步探索時代之風氣與氛圍。不用說，這已超出王國維所謂的「二重證據法」的意涵。

透過本書亦不難發現：作者提出的問題介於通論與專論之間，書中借用弗雷勒（Paulo Freire）的提問：「必須先釐清何為最小課題論域（minimum thematic universe）的觀念。」（見頁 63）同時，這也是一個持續發生、尚未中止的動態發展問題，亦從作者書中第一章章名〈沒有任何事物比死亡更長久〉可以得知。因此，書中談論王國維死亡之事，其實涉及個人、國家與文化整體之面貌，不妨可以說一九二七年只是其中的「落腳點」而已。然而，作者也在書中反覆提出一項困難之處，研究王國維自殺一事不易獲得解答，而且為甚麼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一定會選擇自殺一途呢？之所以如此說的原因：正是因為提出人生疑惑、訴諸自殺者大有人在，在不同文化各有其發展脈絡，亦不是當代人以今度古的答案所能完全解釋。例如書中亦提及莫哈族的死亡神話一事，認為「人類天生有自我毀滅的慾望，並相競效」（見頁 77）。這就適度說明面對同樣類型事件的發展，其實常蘊藏各自不同的思考脈絡。作者勾勒出兩個觀念：一為「權利」、一為「義務」，特別是後者不易理解，假如沒有透過跨文化的比較研究，其實對於自殺的理解，就容易顯得過於單一而平面。

雖然作者將王國維之死與時代變局緊密聯繫起來，但是也充分考量王國維在京都生活的因素所在，即在 1911 至 1916 年於日本京都的生活。作者表示必須「將京都與自殺聯繫在一起的文學值得思考」（見頁 77）。很顯然地，這是將王國維之死置於更廣泛的文化視野，而不僅僅侷限於中國之內。相關議題的陳述，例如李澤厚就曾說：「傳統知識分子將道德交付（hand-over）政治」（見頁 43），然而王國維之死不完全歸於此種交付。換句話說，本書也關心讀書

人的精神觀念，不僅僅在於追求理想崇高的一面，也有其失敗如何調適與面對的層次，而此在中國哲學文化屢屢可見。在此之前，勞思光先生曾說：「中國之衰亂，決非由於人們先不信傳統文化理想而來；反是由於傳統的失效而來」（見頁 45）。由此來說，似乎王國維之死可以彰顯其傳統文化的價值意義，至少必須同時考量理想與失效的雙重面向，而加以重新估量一切價值的時代。

關於清末知識人的處境，余英時認為譚嗣同（1865–1898）在《仁學》中對三綱五倫之說的強烈攻擊是一回事，另一方面卻自詡能發掘儒學的原始精神；<sup>2</sup> 而梁濟的投水自盡，多少也都反映他們對於政治文化中的價值觀念體認，一旦制度解體崩潰，則如同王德威筆下的王國維形象已呈現出「很早就體悟人生巨大的徒勞」（見頁 105）之感。因而帶有某種程度上的預定色彩，即是往痛苦的人生之途前進，逐漸意識到當中的象徵意義。然而，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，加上王國維對於哲學、美學以及種種人文學科的認知體會，促使史家對於王國維為何選擇此條道路，置於更廣闊的文化脈絡底下。王國維對於人生之感觸，亦與其苦讀四次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著作相關，所說「外物之入於吾人感性、悟性之形式中者，與物之自身異。物之自身，雖可得而思之，終不可得而知之，故吾人所知者唯現象而已」（見頁 111）。所以，也不能完全由於外在環境的變動，作為他選擇絕望之途的完全解釋。事實上，他的內心世界以及有意識區分「物自我」與「非我」之說，反映一種現象觀念的客觀存在，也唯有透過他者的思考，方才可以接近真實學問與生命意義之所在。就王國維而言此是孤獨且落寞的，換言之知識主體、道德主體與文化主體等等眾多主體的建立，與歷史發展與時局變化，如何找到接榫之道，則對於當時的知識人造成絕大的困擾與挑戰。

然而，如何理解王國維的痛苦，就不能脫離他所處的社會與歷史。他所經歷的確如思想家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所說「被現時的存在所充滿的時間」（見頁 116）。作者書中之意圖欲透過

2 余英時：《現代儒學論》（River Edge：八方文化企業公司，1996年），頁2。

即「王國維之死，是探索他的道德懷疑主義」或是「民國時期集體的文化危機」（見頁 55）。因此，書中涉及內容以「民國的痛苦」為主題，副標則以「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」呈現。乍看之下，則是採取以小窺大的歷史論述，其實這也扣合歷史學者熟悉的歷史脈絡考察，亦即對於王國維死亡之分析，進一步探索時代之風氣與氛圍。不用說，這已超出王國維所謂的「二重證據法」的意涵。

透過本書亦不難發現：作者提出的問題介於通論與專論之間，書中借用弗雷勒（Paulo Freire）的提問：「必須先釐清何為最小課題論域（minimum thematic universe）的觀念。」（見頁 63）同時，這也是一個持續發生、尚未中止的動態發展問題，亦從作者書中第一章章名〈沒有任何事物比死亡更長久〉可以得知。因此，書中談論王國維死亡之事，其實涉及個人、國家與文化整體之面貌，不妨可以說一九二七年只是其中的「落腳點」而已。然而，作者也在書中反覆提出一項困難之處，研究王國維自殺一事不易獲得解答，而且為甚麼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一定會選擇自殺一途呢？之所以如此說的原因：正是因為提出人生疑惑、訴諸自殺者大有人在，在不同文化各有其發展脈絡，亦不是當代人以今度古的答案所能完全解釋。例如書中亦提及莫哈族的死亡神話一事，認為「人類天生有自我毀滅的慾望，並相競效」（見頁 77）。這就適度說明面對同樣類型事件的發展，其實常蘊藏各自不同的思考脈絡。作者勾勒出兩個觀念：一為「權利」、一為「義務」，特別是後者不易理解，假如沒有透過跨文化的比較研究，其實對於自殺的理解，就容易顯得過於單一而平面。

雖然作者將王國維之死與時代變局緊密聯繫起來，但是也充分考量王國維在京都生活的因素所在，即在 1911 至 1916 年於日本京都的生活。作者表示必須「將京都與自殺聯繫在一起的文學值得思考」（見頁 77）。很顯然地，這是將王國維之死置於更廣泛的文化視野，而不僅僅侷限於中國之內。相關議題的陳述，例如李澤厚就曾說：「傳統知識分子將道德交付（hand-over）政治」（見頁 43），然而王國維之死不完全歸於此種交付。換句話說，本書也關心讀書

人的精神觀念，不僅僅在於追求理想崇高的一面，也有其失敗如何調適與面對的層次，而此在中國哲學文化屢屢可見。在此之前，勞思光先生曾說：「中國之衰亂，決非由於人們先不信傳統文化理想而來；反是由於傳統的失效而來」（見頁 45）。由此來說，似乎王國維之死可以彰顯其傳統文化的價值意義，至少必須同時考量理想與失效的雙重面向，而加以重新估量一切價值的時代。

關於清末知識人的處境，余英時認為譚嗣同（1865–1898）在《仁學》中對三綱五倫之說的強烈攻擊是一回事，另一方面卻自詡能發掘儒學的原始精神；<sup>2</sup> 而梁濟的投水自盡，多少也都反映他們對於政治文化中的價值觀念體認，一旦制度解體崩潰，則如同王德威筆下的王國維形象已呈現出「很早就體悟人生巨大的徒勞」（見頁 105）之感。因而帶有某種程度上的預定色彩，即是往痛苦的人生之途前進，逐漸意識到當中的象徵意義。然而，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，加上王國維對於哲學、美學以及種種人文學科的認知體會，促使史家對於王國維為何選擇此條道路，置於更廣闊的文化脈絡底下。王國維對於人生之感觸，亦與其苦讀四次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著作相關，所說「外物之入於吾人感性、悟性之形式中者，與物之自身異。物之自身，雖可得而思之，終不可得而知之，故吾人所知者唯現象而已」（見頁 111）。所以，也不能完全由於外在環境的變動，作為他選擇絕望之途的完全解釋。事實上，他的內心世界以及有意識區分「物自我」與「非我」之說，反映一種現象觀念的客觀存在，也唯有透過他者的思考，方才可以接近真實學問與生命意義之所在。就王國維而言此是孤獨且落寞的，換言之知識主體、道德主體與文化主體等等眾多主體的建立，與歷史發展與時局變化，如何找到接榫之道，則對於當時的知識人造成絕大的困擾與挑戰。

然而，如何理解王國維的痛苦，就不能脫離他所處的社會與歷史。他所經歷的確如思想家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所說「被現時的存在所充滿的時間」（見頁 116）。作者書中之意圖欲透過

2 余英時：《現代儒學論》（River Edge：八方文化企業公司，1996年），頁2。

王國維於一九二七年之痛苦，勾勒當時所充滿的時間感受；用書中的話來說即是「時間斷裂及驚嚇感」。<sup>3</sup> 再借用張大春對於當代認識的說法，即是「每個時代的所有人就算生活在當代也只能認識其很小的一部分」（見頁 117），因此歷史解釋在此不是「先見之明」，而是扮演某種程度上的「後見之明」。但是，針對王國維對於中國文化有認同與關懷的學者，為何會走上痛苦絕境之途，仍然試圖做出較為宏觀通盤的解釋。回到王國維提出的「歷史團體」的人臣角色，個人本身即是處於此一結構之內，但是一方面又具現代學者的身分，瞭解各種最新學說之發展，上述所說苦讀康德學說四次、在京都生活，以及對於清室的想法等等，使得他的思想生命顯得既前衛又保守，至少擁有兩個不同面向值得探索。作者書中另一有趣之處，即是將羅振玉與王國維做出對比，不論在學術追求與思想性格，更點出其中羅振玉深具商人性格。因此，注意到王國維對羅振玉的債務關係，因而涉及「自由」與否的議題，將王國維的學術生命與現實處境更加緊密聯繫起來，當中蘊含許多權力操作的問題。

本書討論的不僅僅是王國維之死，亦涵蓋政治、歷史與哲學概念的省思，以「自由」為例，到底甚麼是「自由」？又與「自殺」有何關聯呢？如同以撒·柏林（Isaiah Berlin）所說：「我們活下去需要自由的信念，然事實上是不得自由，怎麼辦？」（見頁 130）然而，若以王國維所處的環境來說，在此似乎造成一種矛盾的存在：如何在絕對君主制的處境中尋求自由的條件？另一方面，隨著對東洋西洋知識的吸收，終究無法在當代找到安心之道的再次失落。因此，也不能將王國維之死視為一種孤立現象的存在，背後有其「集體」意涵，包括中國如何被認同，邊界是怎麼界定的，以及所呈現的文化關懷又是如何。王國維的價值觀念受到何種接引，在此書中沒有提供明確的解答，但顯然受到極大的精神危機，余英時認為王國維早在北伐前夕就整個精神崩潰（見頁 167）。但其崩潰之因在於君而不在於國，本書當中的合法性為何，雖然尋得一死仍無法解答

3 此語出自 John Berger (1926–2017)，見於 John Berger、Jean Mohr 合著，張世倫譯：《另一種影像敘事》（臺北：三言社，2007 年），頁 93。

當中所有的原因。其實，這也指出對於中國文化下的自殺，不但不好研究，而且某種程度也是去中心化、去主體的面向，借用王德威的話來說即是「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」（見頁 179）。於是，中國文化下的主體，常以所謂道德主體呈現，而在王國維的筆下，研究之際即帶有濃厚的泛道德色彩。

書中所彰顯學者之學術與生命究竟有無緊密關聯，王國維採取的「二重證據法」的重要性，亦在於提供考證，如同上述所說有濃厚之泛道德色彩；但此中論證如何，似乎必須從他痛苦之強烈得到恰當的觀照。就此面向來說，就與乾嘉考證學相反，不能說是為學問而學問。畢竟，王國維所處之時代氛圍，不能提供給他完全做學問的充裕空間，相對地亟需尋得解決生命困境之良方。就此來說，可以明白他不同於乾嘉考證學者研究之路線，反倒接近理學家所謂之「理」，偏向道德準則的意涵。如果再往個人需求來說，基本的維持生計、疾病苦痛的折磨，以及因為啟蒙而導致的種種不適與調適，都為他的悲劇結局埋下伏筆。王國維曾說：「夫天才之大小，與其知力意志之大小為比例；故苦痛之小大，亦與天才之大小為比例。」<sup>4</sup> 智力意志之大小，竟與痛苦之大小結合起來論述，不得不說這是由黑暗到啟蒙的艱辛過程，充滿道德自覺的感受，竟成為痛苦之來源。為何會導致如此結局？王國維對於未來想像歸於幻滅，政治制度上之專制與共和，終是不可調和之苦，至少在王國維看來終究找不到歷史的合理性，而必須視其為結構上的天翻地覆，如此看來也勢必在勞苦愁煩中度过此種生活困境。如今，透過本書所彰顯之被壓抑的痛苦史，王國維可被還原成傑出學人背後的真實面貌。

王國維不可解之困境，亦加上此種困境之氛圍在全書呈現，也已描繪一幅理解同情之輪廓，進而延伸至嚴肅的哲學問題。也就是說：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時代與自我，不是透過社會改革，亦非革命所能解決，而更扣合於人生而有的痛苦感。王國維的痛苦體驗給讀者的印象是：無時無刻與痛苦奮鬥，不論是為生計、為理想，總會感到不自由之處，但同時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又是必須在此中爭

4 王國維：《靜庵文集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93。

王國維於一九二七年之痛苦，勾勒當時所充滿的時間感受；用書中的話來說即是「時間斷裂及驚嚇感」。<sup>3</sup> 再借用張大春對於當代認識的說法，即是「每個時代的所有人就算生活在當代也只能認識其很小的一部分」（見頁 117），因此歷史解釋在此不是「先見之明」，而是扮演某種程度上的「後見之明」。但是，針對王國維對於中國文化有認同與關懷的學者，為何會走上痛苦絕境之途，仍然試圖做出較為宏觀通盤的解釋。回到王國維提出的「歷史團體」的人臣角色，個人本身即是處於此一結構之內，但是一方面又具現代學者的身分，瞭解各種最新學說之發展，上述所說苦讀康德學說四次、在京都生活，以及對於清室的想法等等，使得他的思想生命顯得既前衛又保守，至少擁有兩個不同面向值得探索。作者書中另一有趣之處，即是將羅振玉與王國維做出對比，不論在學術追求與思想性格，更點出其中羅振玉深具商人性格。因此，注意到王國維對羅振玉的債務關係，因而涉及「自由」與否的議題，將王國維的學術生命與現實處境更加緊密聯繫起來，當中蘊含許多權力操作的問題。

本書討論的不僅僅是王國維之死，亦涵蓋政治、歷史與哲學概念的省思，以「自由」為例，到底甚麼是「自由」？又與「自殺」有何關聯呢？如同以撒·柏林（Isaiah Berlin）所說：「我們活下去需要自由的信念，然事實上是不得自由，怎麼辦？」（見頁 130）然而，若以王國維所處的環境來說，在此似乎造成一種矛盾的存在：如何在絕對君主制的處境中尋求自由的條件？另一方面，隨著對東洋西洋知識的吸收，終究無法在當代找到安心之道的再次失落。因此，也不能將王國維之死視為一種孤立現象的存在，背後有其「集體」意涵，包括中國如何被認同，邊界是怎麼界定的，以及所呈現的文化關懷又是如何。王國維的價值觀念受到何種接引，在此書中沒有提供明確的解答，但顯然受到極大的精神危機，余英時認為王國維早在北伐前夕就整個精神崩潰（見頁 167）。但其崩潰之因在於君而不在於國，本書當中的合法性為何，雖然尋得一死仍無法解答

3 此語出自 John Berger (1926–2017)，見於 John Berger、Jean Mohr 合著，張世倫譯：《另一種影像敘事》（臺北：三言社，2007 年），頁 93。

當中所有的原因。其實，這也指出對於中國文化下的自殺，不但不好研究，而且某種程度也是去中心化、去主體的面向，借用王德威的話來說即是「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」（見頁 179）。於是，中國文化下的主體，常以所謂道德主體呈現，而在王國維的筆下，研究之際即帶有濃厚的泛道德色彩。

書中所彰顯學者之學術與生命究竟有無緊密關聯，王國維採取的「二重證據法」的重要性，亦在於提供考證，如同上述所說有濃厚之泛道德色彩；但此中論證如何，似乎必須從他痛苦之強烈得到恰當的觀照。就此面向來說，就與乾嘉考證學相反，不能說是為學問而學問。畢竟，王國維所處之時代氛圍，不能提供給他完全做學問的充裕空間，相對地亟需尋得解決生命困境之良方。就此來說，可以明白他不同於乾嘉考證學者研究之路線，反倒接近理學家所謂之「理」，偏向道德準則的意涵。如果再往個人需求來說，基本的維持生計、疾病苦痛的折磨，以及因為啟蒙而導致的種種不適與調適，都為他的悲劇結局埋下伏筆。王國維曾說：「夫天才之大小，與其知力意志之大小為比例；故苦痛之小大，亦與天才之大小為比例。」<sup>4</sup> 智力意志之大小，竟與痛苦之大小結合起來論述，不得不說這是由黑暗到啟蒙的艱辛過程，充滿道德自覺的感受，竟成為痛苦之來源。為何會導致如此結局？王國維對於未來想像歸於幻滅，政治制度上之專制與共和，終是不可調和之苦，至少在王國維看來終究找不到歷史的合理性，而必須視其為結構上的天翻地覆，如此看來也勢必在勞苦愁煩中度过此種生活困境。如今，透過本書所彰顯之被壓抑的痛苦史，王國維可被還原成傑出學人背後的真實面貌。

王國維不可解之困境，亦加上此種困境之氛圍在全書呈現，也已描繪一幅理解同情之輪廓，進而延伸至嚴肅的哲學問題。也就是說：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時代與自我，不是透過社會改革，亦非革命所能解決，而更扣合於人生而有的痛苦感。王國維的痛苦體驗給讀者的印象是：無時無刻與痛苦奮鬥，不論是為生計、為理想，總會感到不自由之處，但同時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又是必須在此中爭

4 王國維：《靜庵文集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93。

取，甚至可用「生死力爭」來形容也不為過。從更大的歷史脈絡來看，王國維不是特殊的個別的案例，但是對於學者而言，的確展現他的獨立自由的意志，也為面對痛苦、直視死亡而更加映照人心的幽暗面。作者有意彰顯王國維的敏感性，而有別於過往將其視為埋首於故紙堆的學究人物。事實上他願意更加扣問生命意義之所在，而不僅僅是追求學問而已，因而他對於「死亡意識」的體會，是過往被忽略的一個環節，如今透過本書問世，有意還原更為真實一面的王國維。也就是說：王國維究竟為何而活、為何而死？這是在學術著作中不易察覺，但卻十分重要的文化現象，需要透過抽絲剝繭，才能夠貼近王國維的心靈世界。另一方面，也不能忽略王國維的人格與學問之間關係，本書則在此付出相當的篇幅，由死亡串連起並回溯到生活的人際網絡。

全書呈現王國維痛苦史構成的來龍去脈，過往歷史所說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「三不朽」的解釋，在此顯得有些不同。究竟為何而活，「三不朽」的解釋似乎也無法在王國維之死中找到合理定位，而已偏向一種哲學性的思考方式。作者勾勒的兩大面向是王國維在京都的生活，以及他與羅振玉之間的關係，皆涉及一種人的存在方式，還有生存狀態的敏感度問題。全書也涉及近代中國之前的自殺史，試圖將此議題置於一個更廣大的視野，但是王國維賦予死亡意識的察覺，確是較以往學者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從他四次苦讀康德學說、對於尼采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思想的省思、當然還加上他面臨改朝換代的身分認同，眾聲喧嘩的背景看似客觀他者之存在，實則已經轉化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早已進行較為深入的省思。就此來說，王國維之死若置於文化脈絡之中，就不能僅僅視為被時代風氣席捲之人物，而是有他深謀遠慮的思考過程。畢竟羅振玉是另一種類型，而王國維雖與之相從甚密，卻是不同類型的人物。中國近代學人的心理狀態與文化認同，一直是個有趣的議題。從他們的痛苦與思索過程，反倒可以讓我們更加思索何謂文化、國家、認同等諸多宏觀議題，畢竟他們是認真生活其中，又是能夠深刻感受痛苦

之人。如同書面封底引用法國思想家西蒙·韋伊（Simone Weil）所說：「人是藉著痛苦認識智慧，而不是透過享樂。」<sup>5</sup>

---

5 李建民：《民國的痛苦：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》，（臺北：聯經出版，2022年），封底。